

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

萧超然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 萧超然等著, -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1993.8

ISBN 7-301-02234-4

毛...

萧...

毛泽东思想-政治发展学说-研究

A84

书 名: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

责任者:萧超然 晓 韦 金安平 著

标准书号:ISBN 7-301-02234-4/ A·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 印 者:北京印刷三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95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9.80 元

序

1990年6月,我在《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1991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前言》中曾写道:“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亿万人民群众的政治实践已远远走在了学理研究的前面。因此,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经验,把生动丰富的实践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这是我国政治学界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编著了《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一书,把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中最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论列和剖析,展露于读者之前,算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个初步尝试”。时间过去了两年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晓韦同志、金安平同志合作,共同撰写了这本《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一是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二也是我们从一个侧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政治学所作的又一次尝试。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近现代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实现国家统一、富强的紧迫任务,一百多年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都把他们的智慧和精力,集中投入于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中。他们设计各种政治方案,寻求一条到达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之路。从而,一批又一批众多的政治思想家、理论家和实践家诞生了。孙中山和毛泽东是其中的卓越代表和集大成者。毛泽东的理论主要是关于政治学的,特别是关于政治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其哲

学理论、经济理论、文艺理论等等，都是联系于或围绕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和政治革命而展开的。因此，研究毛泽东思想，理应着重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着重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学说。这既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任务，也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政治学说理应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一块基石。

过去，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的研究与建设，被严重忽视。因此，尽管研究、阐释毛泽东思想的著述很多，但一般多着眼于中共党史的角度，虽则其所研究、阐发的内容，同政治学也并非全无联系；然而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联系于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去研究、阐发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却鲜见。我本人过去致力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五四文化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用比较多的精力关注政治学的建设，是近几年因工作需要才开始的。经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我逐步产生了一个不很成熟的想法，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有必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经验，把政治学的研究与中共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有必要另辟蹊径，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局限于中共党史的角度。有了这个想法，经过这几年的摸索实践以及同其他同志的切磋，现在我似已悟到了一点门径。《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这部书稿写作的完成，就是对上述想法实践的一个成果。尽管它还很粗糙，很不完美，但它毕竟表明了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在经过十年动乱和前一时期自由化思潮几度泛起之后——研究、阐释、确立毛泽东政治学的开始。我认为这是颇有意义的。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我个人来说，对政治学的研究，还处在有如王国维所说这样一种初级的境界。

参看《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页。

但我相信,只要发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忘我精神,就会像马克思所说“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当然,我已过“耳顺”之年,精力不济,是难以作到了。但我深信:有志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青年朋友,是会作到的。吾愿馨香以祝之。

本书的写作,泰半篇章由晓韦、金安平两位同志完成,我只写了很少一部分。全部稿子最后由我看了一遍,作过一些文字技术性的调理。在内容上也力求准确,少出错误。但由于我本人对政治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是半路“修道”。一则对政治学这本“经”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知之不多;二则也难免有可能把“经”念歪。因此很难说会把握得很好。全书分八章,是紧紧围绕政治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与这一主题关联不紧的政治学其他方面内容,则未作阐发和论列。由于水平的限制,书中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蒙海内外学人和专家矜愍赐正,则是我等之大幸也。敢不引领受教!

萧超然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寓所

1993年1月

目 录

引 论	时代对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的呼唤	1
第一章	国情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把握	16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国情观	17
二、	国情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特征	26
三、	国情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特征	32
四、	国情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特征	42
第二章	社会主义导向的政治发展目标	50
一、	中国政治发展的多重目标	50
二、	社会主义的政治导向	55
三、	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59
第三章	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性力量	79
一、	多阶级、多阶层共同推进的政治发展进程	80
二、	人民群众是政治发展过程的主体	92
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主导者	101
第四章	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	113
一、	暴力革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发展道路	114
二、	和平革命:社会转变阶段的政治发展道路	130
三、	体制内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道路	151
第五章	政治动员、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	176
一、	作为政治参与手段的政治动员	177
二、	作为政治参与手段的政治组织	189
第六章	政治稳定与政治改革	200
一、	政治稳定: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保障手段	201
二、	政治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具体实现途径	216

三、稳定与改革并重的政治发展战略	240
第七章 政治文化的重新构建	258
一、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258
二、中国政治文化重新构建的意义及其途径	266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273
第八章 政治体制的现代性转换	281
一、中国政治体制现代性转换的基本方向	282
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总体构成	293
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运作准则	317
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途径	333
附 录 西方政治发展学说述评(姜新浩)	347

引 论

时代对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的呼唤

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是顺应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过程的客观需要,伴随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逐渐衰落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07 年,托洛斯基在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像俄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享有一种“落伍者的特权”,即拥有引进或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特权。在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中,托洛斯基的概念进一步被规范为“迟发展的优越性”。尽管具体效用需另作评价,但正是由于这一“优越性”,20 世纪中国成了形形色色舶来政治学说及其变种的博览会。除开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外,按出现顺序罗列,其影响较大者主要有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杨度的铁血主义、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论、章士钊的政党政治论、胡适的政治自由主义、曾琦等人的国家主义、张君勱等人的社会民主主义、邓演达的平民政治论、蒋廷黻等人的革命专制论、罗隆基等人的中间道路论,以及近年的政治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思潮等等,总共不下 20 余种。这些思潮各自代表一定的社会政治势力,具备在国外思想原型基

参见〔英〕拉贝兹伦:《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78—79 页;〔美〕塞维斯:《文化进化论》,华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36 页。

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思想体系,拥有一批较为坚定和自觉的信仰者,加之往往与某种政治组织相联系,并以某些知名人士为代表人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它们均不同程度地主张或标榜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其目标与内容均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在所主张的具体发展模式方面,它们则互有歧异,并大致可以归并为民主主义的与权威主义的两种类型。除开少数思潮的一度例外,总体地看,上述思潮与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是处于抗衡状态的。可以说,它们低落、衰退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当将其放到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宏观进程中作总体的考察。

鸟瞰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其中包括四次高潮与三次挫折,共为七个时期:(1)1905—1912 年为第一次高潮时期,其标志为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与民国创立;(2)1913—1918 年为第一次挫折时期,其标志为辛亥革命失败与两次帝制复辟;(3)1919—1927 年为第二次高潮时期,其标志为“五四”运动与大革命兴起;(4)1928—1937 年为第二次挫折时期,其标志为整体革命形势长期低潮,国民党极权统治和国家主权严重破损;(5)1938—1956 年为第三次高潮时期,其标志为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6)1957—1977 年为第三次挫折时期,其标志为反右运动扩大化、大跃进和十年“文革”;(7)1978—1992 年为第四次高潮时期,其标志为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拓展。其中前六个时期依次地发生成对组合,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三大兴衰回合,反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而第七个时期的到来,则意味着长期兴衰循环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终于走上了更为平坦与稳固的道路。基于这一宏观把握,我们谨将政治发展客观进程与相关思潮学说兴替的具体关系陈述如下。

1. 政治发展的第一个兴衰回合宣告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发

展学说的初步破产,历史地提出了建立新型政治发展学说的客观要求。

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和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两件大事。前者标志着一支有纲领、有组织的现代化政治推动力量的形成,后者标志着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社会政治整合手段的解体与破产。因此,1905年是传统中国政治与现代中国政治的分水岭,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过程的正式开端。其后,在孙中山等革命派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加之立宪派等其他现代化势力自觉不自觉的努力,中国政治发展事业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的主要成就即为辛亥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状态,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从而为现代政治社会构建创造了基本前提。民国创立之初的现代政治建设,突破了孙中山关于军政、训政的设想,最初是按照宋教仁、章士钊等人所倡导的议会民主、政党政治等西方式民主主义政治发展模式进行的。从国家政治结构来看,两院制、责任内阁、议会党团诸般设制俱全;从社会政治参与来看,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种种权利皆有。一时间,新创政党组织400余个,新办政治性报刊500余家,县、省及中央等各层级的竞选一再与普遍地进行,政府行为稍有不符,议会、政党和舆论便质询弹劾,举国颇有西方式政治民主之势。但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与封建传统势力未除,专制性、宗派性的传统宗法—臣服型政治文化未消,结果前者使得袁世凯再度崛起,后者造成革命派内部同室操戈,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争意见而不争政见”,引起现代化政治势力内部的严重派系化。袁世凯从当政之日起,一则积极扩充武力,一则运用“以党杀党”的传统权术手段,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载《北洋军阀史料》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丝毫无意按照宋教仁、章士钊等人所规定的政治规则参与他们自导自演的民主游戏。及见议会选举已落下风,则索性刺杀宋教仁,随之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资格。1913年7月,孙中山等人被迫进行“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无疑具有积极的政治内容,但是这种暴力政治形式的再度运用,实际上是无声地宣告了西方式民主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在中国的破产。

二次革命前后,袁世凯羽毛尚未全丰,仍然要维持一种“开明”的政治形象。这位既有权威且又开明的袁大总统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勾起梁启超等人在请季末年即已做过的权威主义旧梦。现在,轮到他们按照权威主义政治发展模式来构造中国了。梁启超等人是主张民主化与法制化的现代政治的,他们的理想是制定一部宪法,使中国走上宪政之路。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后明确宣布,“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制国是也。”其具体内容则体现于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主要包括国会制、多党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县乡两级地方自治以及文官制度等。同时,梁启超在当时发表的《说幼稚》、《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章中,又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幼稚,还不能直接广泛地推行民主政治,必须经过开明专制的过渡阶段,即实行所谓“保育政策”。所以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中,他提出“国权与民权调和”等三大原则,这就与主张分权的民主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区别开来,而与德、日等国当时奉行权威主义模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在“强有力之政府”口号下,他们把袁世凯当成了同是武人却又开明的华盛顿与拿破仑,在政治上和舆论上捧起了袁世凯,企图“暂时稍为假借”袁氏的权威,逐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袁世凯却不是拿破仑,更不是华盛顿,他要的权威不是能够推动政治发展的开明权威,而是赤裸裸的个人封建专制权威。1913年

《熊秉三先生政书·雄辩》,第5页。

9月,梁启超见势不妙,致书袁世凯委婉地劝说道,“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勘乱国治,惟当扶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为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试图多少为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留下一点地盘。孰料袁氏一介旧式武夫,不但容不得国会政党,对共和制也甚为厌恶。1914年初,袁氏下令解散国会与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继而闹出洪宪帝制的丑剧。至此梁启超等方知上当,大呼“异哉”,被迫发起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同样有其积极意义,但梁启超等人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去反对自己昨天刚捧出来的“权威”,这件事本身同样也就说明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破产。

当然,民初民主主义、权威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破产毕竟是初步的,因为这一结论在当时并未成为大多数人的强烈共识。但是在有识之士中,它却引起了无限的思想波澜。老调子既已唱完,他们只能在历史的呼唤下移情于新型的政治发展学说了。

2. 政治发展的第二个兴衰回合宣告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进一步破产,初步证明了新型政治发展学说的功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袁世凯辈的倒行逆施严重阻滞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但决不能完全改变社会进步的内在规律。由此,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状况出现了奇异的断裂。在消极方面,清王朝的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剧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分裂、战乱与动荡,严重妨碍了现代化所要求的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有效汇聚和配置。在积极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一个短暂的蜜月,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并开始独立地出现于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亦有所壮大;经过清末以来持续十余年的

新式教育运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阶层至此正式形成,并立即以高度的自觉掀起了声势空前的新文化运动。同时,苏维埃俄国与共产国际的相继建立及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真诚支持,使中国政治发展第一次被纳入世界进步事业的范围,从而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同情与援助。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一则使得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更为显著,一则使得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观因素大大增强。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发展学说基本原理及对中国国情的初步探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明确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发展纲领,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实际政治活动。绝望中的孙中山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历史的这一光明,开始逐步与共产党人合作。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结果大大增强了其三民主义学说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政治功能。孙中山的政治旗帜历来不甚鲜明,如“反清”、“讨袁”、“护法”等,意义过于狭直,难以涵盖民族民主革命的多方面内容。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他改变了这种做法。1924年底,他接过陈独秀等人首倡的“国民革命”旗帜,正式拉开了以反对列强、铲除军阀为明确政治内容的国民革命的序幕。经过共产党人直接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民众运动,国民革命于1926年7月转入军事行动阶段。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北伐军会师长江,席卷整个南部中国,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革命。国民革命的凯歌般行进不但初步显示了新型政治发展学说的巨大威力,而且为尔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国民党左派缺乏足够的政治警惕,蒋介石利用新三民主义政治发展学说和国民党组织中残存的权威主义因素,逐步窃取和膨胀了自己的权力。1927年4月起,蒋介石为首的右翼势力相继叛变,国民革命随之功败垂成。

定都南京后,蒋介石按照新专制主义政治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蒋介石拒绝进行任何社会政治改革,以暴力手段进行强制性社会政治整合,对于异己政治势力,军事征伐、政治拘捕及思想迫害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本质而言,其统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在具体统治形式上,他却也植入了一些现代性因素,如五院制的权力结构形式,一党制的政治输入形式,以及所谓三民主义的价值信仰体系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蒋介石能够以孙中山和国民革命事业继承人的身份相标榜,在“打倒军阀”旗号下讨伐异己,在“训政”幌子下统治人民。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传统专制主义相比,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确乎具有更多的“开明”和“现代化”油彩。于是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遂把推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希望放到了蒋介石身上。胡适不愧是自由主义的老将,立即嗅出蒋氏新专制主义的血腥味,对南京政权时作针砭,继续维持了原先的信仰。然而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名人巨子,如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则弃胡而去,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转入蒋介石阵营,开始重织梁启超等人的权威主义旧梦。至此,自由主义老店虽说还有胡适暂时支撑着,虽说还有一些人恋旧似地常常想起这家老字号,但其破产已成定局。

现在,又轮到权威主义政治发展学说了。1934年间,蒋廷黻等人在《独立评论》杂志发表了《革命与专制》等一系列文章,明确主张由国民党政权实行“革命专制”以凝聚民心国力,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化。在本世纪中国思想史上,这是继梁启超、杨度之后权威主义思潮的第三次沉渣泛起。胡适再度披挂上阵,发表《建国与专制》等文章坚决反对。双方争论了一年多,难解难分。胡适的反驳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实已再次为权威主义思潮作出了结论。1928—1937年间,蒋介石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军事独裁,扶持官僚资本以抑制民族资本,建立了党化教育、新闻检查等

一整套严密的思想控制制度,等等一切,说明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实际上只是以专制、贫困、愚昧为特征的传统封建统治的再版。在此统治下,“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甚至不加入共产党而只是对蒋介石不满者,也要像杨铨、史量才一样遭到暗杀。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蒋介石对外妥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方针。众所周知,在20世纪特定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必须同时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与内部民主建设的同时性特征。就此而言,蒋介石专重“安内”的政治方针本身就是违背中国政治发展客观进程的。何况这一方针的实际内涵就是剿灭共产党人和国内其他民主力量,其荒谬和危害就更加显露无疑了。结果,国土大片丧失,国家主权严重破损,不但现代民族民主国家无以建立,即使起码的民族生存也危在旦夕。面对严酷现实,那些权威主义者以及一度对蒋氏权威抱有幻想的人,或者像蔡元培等人幡然悔悟,或者像朱家骅等人索性沦为独裁者的帮凶或帮闲。至于作为一种政治发展学说的权威主义,则已确定无疑地破产了。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次挫折时期,共产党人独立担负了继续这一事业的艰巨任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转入农村从事武装斗争,逐步形成了切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学说。在这一学说的指引下,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局部区域出现了以土地革命战争为形式的政治发展高潮,并开始逐步具备把这一高潮推向全国的形势。但是,王明等人所奉行的错误政治发展学说及其政策,再次断送了这种可能。1919—1937年间,在中国政治发展纳入世界革命轨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共产国际与苏联越来越多的干涉。在共产国际的指令或影响下,陈独秀、王明等人或则照搬西欧经验专注民众运动,或则照搬俄国经验专注城市战争,结果依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8页。

然不能有效引导具体发生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造成了这一过程的中断与倒退。这就表明,建立切合国情的政治发展学说并使之成为实践性的指导学说,已极其强烈地成为历史的内在要求。

3. 政治发展的第三个兴衰回合宣告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彻底破产,充分证明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的巨大威力,并严峻地提出了坚持与完善这一学说的重要意义。

由于日本全面对华战争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争取,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缓解了鸦片战争以来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为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事业创造了空前有利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但是尚未到一年,蒋介石再度挑起全面内战,使中国重新陷入战火与政治动荡之中。1938—1949年间,随着人民民主力量的增长,蒋介石“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即“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和“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在这种政治状态下,国民党政治制度的功能分化缓慢,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社会制约,也不存在党内制约,一切权力最后集中于一个人手中。由于这种政治制度的巨大封闭性,蒋介石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进行农村土地改革,拒绝提供社会性的政治参与渠道。为了维持现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他把一切要求变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寇仇,选择了暴力压制乃至肉体消灭的传统整合形式,放弃了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合理调节。因此,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完成社会整合,其统治始终缺乏得以真正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事实证明,由于国民党政治制度容纳政治参与的系数极低和制度创新能力极为贫乏,其他社会政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治群体的变革要求只能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统治。

那么,由谁取代,怎样取代呢?

按照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统治,应该由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所取代,这一点是民主主义者和权威主义者较为一致的共识。在具体取代方式上,民主主义者主张采取英美模式,即以中产阶级为轴心,通过合法或半合法的舆论宣传与政治结社活动,逐步推行政治动员和扩大政治参与,最终实现民主政治;权威主义者则主张采用德日模式,即依靠一个开明的专制权威,在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由其主动扩大现行政治体系的弹性并进行制度创新,逐步减少现实社会中的传统成分,最后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按照民主替代方式的划分,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论、章士钊的政党政治论、胡适的政治自由主义、张君勱的社会民主主义、邓演达的平民主义等基本可以归入民主主义类型的政治发展学说;反之,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杨度的铁血主义、曾琦的国家主义、蒋廷黻的革命专制论等基本可以归入权威主义类型的政治发展学说。上述学说曾经发生过性质各异、程度有别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但经过数十年实践,它们无一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均严重悖离中国国情。

从权威主义来看,其核心要素为一个具有某种约束机制的个人权威。在西方社会,以王权为表现形式的个人集权是在与教会、诸侯权力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成熟不久就受到近代化势力的挑战,基础脆弱,历史短暂,未能成为一种牢固的政治传统。由此而来,在近代化初始时期即使出现了个人权威,这种权威的力度及合法性基础也不甚强大,客观上受到分权传统的约束。由于无从向传统寻求支持,西方近代化初期的个人权威往往被迫支持或容忍某些社会进步与变革,以扩展自己的权力总量与合法性基础,